

◀ (上接2版)

济史》、胡如雷讲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》、刘乃和讲《历史知识讲座》、王利器讲《古文选读》。

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。“文革”十年、晃荡十年了，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，谁不想上课？其实，在“文革”后期，只要有一点点工夫，人人都在用功。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、或是学了日语。我们的历史系，考古专业老师的成果最早见了天日。发掘的发掘，发文章的发文章；历史专业老师的抽屉里，也有不少存货。对于这一点，邓先生可能估计不足。

不满尽管不满，可在邓先生面前敢于表达出来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我担任总支书记，觉得有责任反映给他；可怎么说出来，也很费心思。一天，趁着有事，我到邓先生家里，先说了些别的，挺顺利的，最后才说请人上课的事。那个时候，新闻、电视里正连续报道日本从中东引进石油的事，我拐弯抹角，只说请人讲课虽好，可中东的石油一断，就麻烦了。我刚把话说完，邓先生就把脸一沉，说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支持我的改革，原来你不支持。今天晚了，不留你吃饭了”——吃饭，这事打从哪儿说起呢？邓先生从没请我吃过饭，当天也完全没提过吃饭的事。他的意思我明白了：不留你了，你走吧！

跟邓先生的接触多了，我有一点感悟。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；他的表达，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。如像邓先生所说，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，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，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。事实上，商鸿逵、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；张广达、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，也开了课。世界史方面，他没有外聘一人，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。

从校外请人讲课，应了一

时之急，应无异议。今天拿出当年的课表一看，还得承认，授课的水平保持在相当的高度。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，像这样一张课表，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。邓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，让77级、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，平心而论，确属难得。拨乱反正原是全国的部署，这几位外聘讲课者所在的单位，拨乱反正随后也被提上日程，他们在北大讲了一阵，便陆续回到原单位去了。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抢先一步，打了一个时间差，成就了此事。我当时只忙一些杂务，跟学生没有接触。隔了好长一阵，才听说这批学生的程度非同一般。后知后觉的我这个时候悟到，如果按照以前36楼那个模式，任谁都可以登台上课，有人让学生轰下讲台，也说不定。

应急之外，邓先生也有长远打算，那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要调几位名家进入历史系。邓先生先后提出调入的有三位王先生。

第一是商调王利器。王利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部门工作，1973年跟邓先生一起在中华书局标点“二十四史”。后来他整理古籍近两千万字，大有成就。社会上“万元户”兴起的时候，他被人们称为“两千万富翁”。这位“富翁”的调入一直没有进展。二是商调王仲荦。王仲荦也是邓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“二十四史”的同伴，1951年到山东大学任教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有过一本有名的杂志《文史哲》，他是三位创办者之一。王仲荦本是章太炎的弟子，周一良后来挽王仲荦时有一联：“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，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。”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生，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次去函商调，王仲荦本人很客



1990年代，邓广铭（前排右）与周一良（前排左）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活动



1980年代，邓广铭（左一）与学生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

气，只说：“山大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”（见《中国历史评论》第二辑27页。姬妍、周应奇：《一代史学宗师——王仲荦》，原载《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”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思，他们没有用人事部门惯用的业务语言做出制式的回答，而是有一封书信发给北大说，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过来！邓先生本来决意调王，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，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再提起。

山西的节奏好像比北京慢一点。商调第三位王永兴的函件一去，对方山西教师进修学院表示同意。可调人的手续办起来相当繁杂，按照常规要耗费很多时日。在办理后续事务的过程中，对方的口气慢慢出现变化。办到山西省教育厅一层，卡住了。王永兴的分量，到这个时候，山西慢慢掂了出来，跟着事情就完全变了。眼看满盘全输，这下急坏了邓先生。

后来调动顺利成功，王永兴先生来到历史系任教，说起来这完全是个戏剧性变化。这

里就要说到一个人——逝去多年的李培浩。1959年，他毕业于历史系，当时还是一位青年教师。他头脑灵活，人很活跃，办事也热心。那几年，他给邓先生帮忙，出出入入，做了不少事。他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，全凭热心。一天，邓先生、我、李培浩三人说到王先生调动受阻的事，李培浩说，教育厅不答应，只有找省里一条路了。可省里找谁呢？我们当时知道的就是省委书记。从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是李立功。李培浩说，请北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周林写信给李立功。周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，周、李二人应有同僚之谊，就是没有交集，也会彼此相知。商量了一会儿，又觉得，先报告周林，等周写信寄李，到达后者手里又是什么时候，更不可知，这个办法的流程太繁，恐怕来不及。后来说，干脆我们起草一封信给周林，请周签字发出就好。最后李培浩说，我们何不用周林的名义写封信，直接寄给李立功本人亲启，或许还来得及挽救。邓先生说：“好！这个主意好。周林跟我说过，让我放手干，凡对历史系有利的事，他全支

持。我以后会报告周林，他不会不同意。”又对我说：“现在就写。你动笔，竖着写。”我写个抬头“立功同志”就打住了，总得像熟人一样先问候几句做个铺垫吧，可说什么呢？周林和李立功，都当过省委书记，至于他们的其他关系，我们三人都不甚了了，往下没词儿了。还是李培浩灵便，他说就写“文革”十年，我们都有磨难——一笔带过，跟着写，现在我出任北大，兹有一事相烦……三个人凑写了一封信，当天发出。后来的事情居然出现转圜，调动成功，是不是跟这封信有点关系则不得而知，要知详情，那只有到山西省去查看档案了。

王永兴先生调来了，此后又生出许多故事。邓、王两位的合作，可以说是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最后“烧”出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来。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了，历史系少了半边天；另有一个中古史中心新生出来，历史系的分量没减，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，仍是第一重镇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、教授）



1980年代，邓广铭在学术会议上发言